

# 清代士人婚姻：礼与情的双重个性

姜楠

《执子之手：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一书，通过大量士人日记、书信与诗文，挑战了传统认知中“包办婚姻无情感”的刻板印象。本书从清代士人夫妇的私人文献出发，揭示了礼制框架下夫妻情感的多样可能：既有共同经营生活的“伴侣之爱”，也不乏诗文唱和中的浪漫表达。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历史情感现场，展现儒家经典如何既规范婚姻，又为情感提供文化资源，交织出真实动人的伉俪之情。



清代士人夫妇的日记与诗文打开了一扇被礼教帷幕遮蔽的窗户，数百年前的婚姻生活里，伉俪之情早已在字里行间悄然绽放。在礼制与情感之间，《执子之手：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一书（以下简称《执子之手》）重塑了对清代婚姻的认知。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婚姻的认知普遍偏向于负面评价，尤其强调包办婚姻对个体情感的压抑。然而，《执子之手》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这种对“情”的复杂态度——既在儒家经典中赋予诗歌表达夫妻情感的特殊地位，又在礼仪中严格规范“夫有有别”，构成了理解古代婚姻的重要文化背景。

历史学者卢苇菁基于大量士人日记、夫妇书信与诗文手稿，重新审视了清代婚姻中真实而复杂的情感图景。《执子之手》一书挑战了人们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即认为传统包办婚姻无法带来幸福。通过深入分析清代士人夫妇的文字与生活，卢苇菁展示了无数夫妇如何在“礼”的框架内，经营属于彼此的“情”的天地。

儒家经典对夫妻关系的定义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礼记》明确规定了“夫有有别”的观念，另一方面，《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却是中国历史上表达爱恋和夫妻之爱的源泉，它收录了大量描写渴望、相思到欢乐、幸福等各种情感的诗篇。这种双重性反映了儒家教义中互补的两个方面：礼仪强调社会和家庭责任，《诗经》关注情感和个人需求。清代士人从小接受《诗经》教育，这为他们在夫妻关系中表达和体验情感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与表达框架。

卢苇菁的研究方法颇有特色，堪称重返历史现场的情感史。她通过挖掘大量私人文献，重返清代婚姻的历史现场。这些一手材料包括士人日记、夫妇书信、家族记录与诗文手稿。相比郭松义在《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中运用的方志、档案、族谱等“公共”史料，卢苇菁更聚焦于私人领域的情感表达。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使我们能够听到历史中普通人的声音，而非仅仅看到制度规定和社会规范。书中的个案研究尤为生动，例如作者关注到沈复《浮生六记》中与妻子陈芸的情感互动，以及诸多士人夫妇在诗文唱和中培养的深厚情感。

《执子之手》深入探讨了清代婚姻中情感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在包办婚姻制度下，新婚夫妇往往确实是“陌生人”。然而，通过婚后共同生活的磨合与互动，许多夫妻逐渐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书中特别强调了“婚后恋爱”的艺术，即夫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情感。作者引入“伴侣之爱”与“浪漫之爱”的概念，认为清代士人夫妇虽无西式婚前恋爱，却常通过诗词唱和、日常共处，培养起伴侣之爱，并不乏浪漫之爱的体验。

清代的婚姻关系受到严格礼制框架的约束。《礼记》推崇严格规则以维护“夫妇之别”，然而，在这些外在约束下，清代夫妻之间仍然发展出多种形式的亲密关系。《执子之手》中描述的“与妻灯下共观”“让妻管理家业”等场景，展现了夫妻关系的多样实践。卢苇菁认为，清代婚姻生活形成了“一道光谱”，一端是排斥私情的严厉道德家，另一端是多情的诗人。而且，立场和声音很容易因文体的转换或作者担任的角色不同而被修改。这种灵活性导致了某些作者的“双重个性”：他们在写作道德条文和注释经典时严谨刻板，而在创作诗歌时却情感充沛。

清代士人面临的社会压力是复杂的。郭松义的研究揭示，清朝政府大力倡导贞节观念，受表彰的节妇人数急剧上升，甚至超过了以往所有朝代的旌表总和。《执子之手》并未回避婚姻中的暗面与张力。除了描写伉俪情深的理想婚姻，书中也关注到那些“失败的佳偶婚姻”。

清代婚姻中存在着与统治者倡导的婚姻伦理观相背离的倾向，这与传统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清代士人夫妇的情感生活犹如一幅水墨画，在礼制的浓淡墨色间，点缀着情感的灵动色彩。在《执子之手》中，“礼制”与“情感”并非简单的压制与反抗关系，而是构成清代士人婚姻生活的经纬线，共同织就了一幅既符合社会规范又充满私人温情的复杂图景。

书中丰富的细节，为我们理解这一动态关系提供了活生生的注脚。书中多次提到，士人夫妇的诗词唱和，是一种高度符合其身份与文化修养的情感互动。例如，一位丈夫在诗中称妻子为“闺中良友”，妻子则依韵和诗，表达“琴瑟和鸣”之乐。这种交流，外在形式完全符合儒家对“有文化的夫妇”的理想设定“夫妇有义”，但内核却是秘密的亲密情感。礼制下的“琴瑟和鸣”比喻，在这里从一种社会理想，转化为个人情感的真实体验。

在礼制未严格规定或视线不及的“空隙”处，情感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与适应性。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载与妻子芸娘女扮男装共游庙会的著名逸事，便是这种“公私分野”的极致体现：在公众面前维持了“礼”的体面，却实现了“情”的共鸣。

在《执子之手》书中并未将清代婚姻浪漫化，而是同样展示了当情感需求与礼制规范发生冲突时的张力与调适。尽管有“举案齐眉”的理想，但现实中的夫妻可能有性格、兴趣的差异。书中提到，有些士人渴望与妻子诗文唱和，而妻子却更擅长或只关心家事管理。此时，一种更务实的情感便可能产生——基于相互尊重、各尽其责的“伴侣之谊”。这种情感或许不那么浪漫，却同样稳固，它是在礼制规定的角色分工基础上，发展出的另一种形式的夫妻关系。

《执子之手》通过大量细节揭示，清代士人的婚姻，是在一套精密的礼制语法中书写各自独特的情感篇章。他们既是社会规范的遵守者，也是个人生活的创造者。正是在这种既定框架内的微妙运作与创造性实践，使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古老誓言，超越了冰冷的礼教条文，成为无数具体人生中真实可感的温暖与坚韧。这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生活与情感世界，提供了远比“压抑—解放”二元叙事更为深刻、细腻和真实的图景。

## 古人的朋友圈与生活雅趣

刘梦泽

翻开《幽梦影评注》，张潮笔下的文字立即将人带入一个充满诗意的生活场景。这部创作于清初的文人小品，其独特的评点形式宛如今日的朋友圈互动，展示了一幅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美学的立体画卷。最新出版的《幽梦影评注》不仅对原文作了精当注释，而且收录了众多同时代文人的评语，使得这部经典作品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审美维度。

《幽梦影评注》的版本选择本身便体现了学术的严谨。编者以康熙末年版本为底本，这个版本收录的正文与评语最为完备。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包含200余则清言小品，每则文字简洁而意境深远。更引人注目的是书中收录的众多时人评语，这些评语与正文一同刊行，形成了独特的文本形式。在结构上，书前有前贤余怀、孙致弥、石虎、王晔等人的题词与序言，书后附有张熊、江之兰、杨复吉、葛元煦

等人的跋文。附录中还专门列出了评语作者一览，为读者提供了更全面的背景信息。

此次评注本最引人入胜的特色，是保留了原作与众多友人的评点互动，这种独特形式被一些学者称为“古人的朋友圈”。这种评点不是单方面的解读，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张潮写下“赏花宜对佳人，醉月宜对韵人，映雪宜对高人”后，友人余淡心便幽默地回应：“花即佳人，月即韵人，雪即高人。既已赏花、醉月、映雪，即与对佳人、韵人、高人无异也。”这种互动不仅是文学上的交流，更是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的共鸣与碰撞。有学者专门研究了这些评点的特点，将其分为五类：观点相近的赞同之声、另有想法的补充之言、意见相左的反驳之意、机智幽默的调侃之语和轻松闲赏的调侃之情。这种评点互动的形式，使得《幽梦影》不再

是一人的独白，而是一群文人共同构建的审美空间。每个人都在这个空间里分享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悟，使文本更加立体、多元。

张潮在《幽梦影》中展现的生活美学，核心在于将日常生活提升到诗意层面，赋予平凡生活以审美价值。他写道：“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将四季的变迁与阅读的心境巧妙对应，创造出一种富有节奏感的生活美学。这种生活美学不仅关注外在的形式，更注重内心的体验。张潮关于读书的三个境界尤为精辟：“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台上玩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除了文字之美，《幽梦影》中还蕴含着丰富的听觉美学。张潮善于捕捉各种自然之声，并将其转化为审美对象。他列举了一系列“值得倾听”的声

音：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欸乃声。

更为有趣的是，在描写了这些雅趣之后，他突然笔锋一转：“若愚少斥辱，悍妻谗谤，真不若耳聩也。”这种对比既显幽默，又暗含对理想生活环境的向往。友人朱菊山对此评点道：“山老所居，乃城市、山林，故其言如此。若我辈日在广陵城市中，求一鸟声，不啻如凤凰之鸣，顾可易言耶。”这番回应道出了城市生活者追求自然的难度，增加了文本的现实厚度。

《幽梦影》中的生活美学不仅停留在感官层面，更触及了哲学思考。书中有一则关于观月的感悟：“新月恨其易沉，缺月恨其迟上。”友人冒青若对此评点道：“天道总盈，沉与迟请君勿恨。”这一回应将个人感受提升到宇宙规律的层面，展现出中国古代哲学中“顺应自然”的智慧。

## 读到

### 生命时刻也是文学时刻

李海卉

“我们翻开一本书，其实是在翻开一个生命。”这句话可以看作是连接《持日记》和《书人久长》两本风格迥异之作的灵魂线索。一本是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非洲故事集，一本是中国作家姚峥华的书话随笔集，她们在不同纬度上，共同诠释了“生命时刻如何成为文学时刻”这一命题。

《持日记》是多丽丝·莱辛的非洲故事集第二辑，收录19个以壮阔非洲为背景的短篇。这本书记录的是莱辛在津巴布韦农场的成长经历，将目光投向非洲大陆上的人、狗、蚂蚁、蝗虫、太阳和金龟子。《书人久长》则是姚峥华“书人书事系列”书话随笔集第九种。这本书扎根于当下文学现场，聚焦文坛书人书事，以书评人的独特审美和判断，对文学现场中的个案作一次类似田野调查式的巡访和勘探。这两本书在题材上看似南辕北辙，却共享着同一种内核——对真实生命的忠实记录与深刻关怀。

多丽丝·莱辛笔下那只金龟子在非洲烈日下缓缓前行，这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生命隐喻。作家用这一意象巧妙地将微小生命与宏大宇宙相连，暗示着莱辛在非洲故事中追求的世界境界。莱辛在书中呈现的“令人惊叹的生命时刻”，往往体现在平凡的日常中。《饥饿》一篇，让人“看到掉进书里”；《两只狗的故事》，作家认为这是“我最好的小说之一”。莱辛以其少女时期在几无人烟的农场里做的细节观察和强烈的情感穿透力，将非洲大陆上的生命百态转化为永恒的文字。

与莱辛的非洲荒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姚峥华的中国文坛书斋。《书人久长》彰显出作者的多样关切：既有“说掌故”（《为何杨步伟的骨灰葬金陵别处》《钱钟书先生信里的“吴先生”》），也有“探佚存”（《还有未刊的胡适日记而世》），还有“观史实”（《黄永年的政治分辩史》《姚大力讲“元”》）和“活新知”（《剑桥凯恩斯书橱里的宝贝》《安妮·埃尔诺极致的“刀”》）。姚峥华关注事实背后的真实，力图挖掘被遮蔽、被埋没的文本及其真相。她不只是简单地记录文坛逸事，而是试图通过这些故事，还原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文化生命。这种鲜活、真实的风格，恰恰与莱辛在非洲故事中追求的生命质感不谋而合。

莱辛在《持日记》中写道：“我们的想象塑造我们，保持我们，创造我们。当我们被撕碎，被伤害，甚至被毁灭时，我们的故事将重新创造我们。”姚峥华则通过《书人久长》告诉读者：“书是死的，但书后面的作者是活的，书不过是一个个指引标志，指引着我们去寻索值得认识的活生生作者。”

两本书，一种追求，在文字中寻找生命，在生命中创造文字。莱辛描绘着她的非洲草原：粉红色的朝霞、暗绿的树木，一只亮绿色的金龟子正在悄悄爬过。姚峥华则在中国文坛的故纸堆中寻找被埋没的文本真相——这两本书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共同编织了关于生命与文学的深刻对话。我们看到的是同一种文学精神的两种表达。真正的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更是与生命相遇——无论这生命是一只非洲草原上的金龟子，还是一位中国文坛的往昔文人。

### 荐书

#### 风雅与思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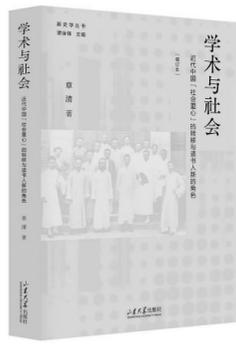
《风雅一隅：关于故里与母校的情绪记忆》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带有浓烈情绪记忆色彩的散文集，也是鲁枢元教授80年人生的深情回望。全书细致描绘了将近一百年来开封的社会生活、风俗人情与精神氛围，将历史、人情与他个人的生命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饱含私人情感温度的精神地图。



《覆巢之下：一位江南士绅的日常生活与明清鼎革》  
中华书局

作者朱亦灵通过对嘉定士绅侯岐曾日记的细致考察，还原其真实生活。作者引入生活史的视角，详细讲述侯岐曾作诗唱和、迎来送往以及饱受困顿等生活细节，比照其后世被塑造为“忠孝节义”的单一形象，就更能看出历史书写的复杂幽微与婉转曲折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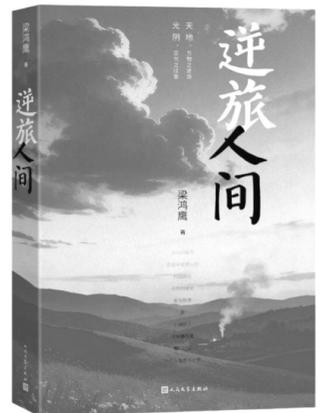


《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修订版）  
山东大学出版社

本书从“学术与社会”这一视角出发，围绕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这一主题，从社会科学视域提出问题，以历史学角度和方法回答与阐述，让后科举时代读书人阶层的历史沉浮清晰起来。

## 在时光棱镜中完成心灵考古

王陶然



个人记忆如何编织时代图谱？梁鸿鹰的《逆旅人间》是一部沉潜而深具分量的作品。书名取自李白“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的千古慨叹，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性的点缀，更昭示了作者将个体生命置于浩瀚时空坐标中进行审视与书写的野心。这部依托《当代》杂志同名专栏集结而成的散文集，收录了

《遥远的魔咒》《那些未被遗忘的》《校园烟云》等十篇作品，它们如同一组精心打磨的棱镜，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一代人复杂的精神历程与心灵图景。

《逆旅人间》的核心张力，首先体现在记忆书写的双重维度上。一方面，它是极其私密和内省的。开篇之作《遥远的魔咒》如同一把钥匙，揭示了作者生命最初的动力与创痕。祖父临终前一句“没出息”的评判，成为缠绕多年的心灵“魔咒”。这种体验，无疑是高度个人化的。然而，梁鸿鹰并未让书写沉溺于私怨或自怜。他通过精湛的文学转化，将这种极具私人色彩的对“抗”，升华为一代“县城青年”乃至更广泛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青年的共同精神履历。他笔下那座北方小城，有风沙与土语，有生动的风俗画卷，更有《那些未被遗忘的》《小城好人》《一个人及若干个梦》中血肉丰满的众生相：姥姥、小孟、卢大脚、老杨头、小包、新媳妇、姚克仁……这些人物并非田园牧歌式的符号，而是携带着生活本身粗砺质感的真实存在。作者以克制而深情的笔触，将他们从时光之河中打捞出来。于是，这座具体的、地理意义上的小城，在文字中逐渐蜕变，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学

意义上的“故乡”化身。这个“故乡”，是来处，是背景板，是精神得以成型的最初模具，同时也是这一切出走、回望与反思的永恒参照系。由此，记忆完成了从“我”到“我们”的跃迁。

如果说深邃的集体观照是《逆旅人间》的思想骨架，那么其独特而成熟的叙述艺术，则为它赋予了丰满的血肉与动人的神采。梁鸿鹰的散文艺术，突出表现为一种自觉的、充满智性的叙述策略。

首先是叙述视角的精巧调度与融合。作者善于“在成人视角与少年视角中跳进跳出”。在回忆童年与故乡时，他时常启用“少年视角”，以那原始的敏锐、新奇甚至略带陌生的眼光，去重新打量世界。这种视角滤去了成人世界的功利与成见，保留了感知的鲜活与战栗，使得往昔的人物、事件与氛围得以原初般复活，产生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然而，作者并未停留于此。他会自然而然地切换到“成人视角”，以一种饱经世事后的理性、反思与悲悯，对过往进行重新审视、解读与评判。

其次，是“智性写作”对日常经验的淬炼与提纯。与沉溺于感性追忆的篇章形成互补，《逆旅人间》中另一部分作

品，充分展现了作者“写作的智性”。梁鸿鹰擅长“以小见大，从人们习焉不察的地方深挖”。他将极其个人化的感受，与广博的阅读思考、深邃的人文关怀紧密结合。这种写作，是一种“重新发现世界”的过程。它要求作者不仅是生活的记录者，更是思想的勘探者，能够将日常经验的碎片，淬炼成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结晶。

在文体意义上，《逆旅人间》是当代散文创作一次沉潜而扎实的回归与拓进。在各类跨文体实验盛行的今天，梁鸿鹰选择以经典的散文笔法，来处理核心的人生议题，这本身需要一种对文体本体的自信与坚守。作品通过主题的内在聚合，实现了对“系列散文”这一形式局限的超越。虽然各篇独立成章，但全书紧紧围绕“人生记忆”与“时代际遇”的核心线索展开。从童年原点到青春远行，从故乡人物到异乡乡思，从具体事件到抽象哲思，篇章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精神脉络与逻辑递进。它们如同“一颗宝石的多面”，共同折射出作者所追求的这种“生命经验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并非人生故事的巨细靡遗，而是一种通过文学反思达成的精神上的整合与澄明。